

中共红色情报员李苦禅

参加“五四”“一二·九”

李苦禅（1899—1983）出身贫寒家庭。原名李英杰、改名英、字励公。山东高唐人。1918 年结识画家徐悲鸿，获授西洋技法。1919 年以聊城二中学生代表身份赴北平，参加“五四”以及“六三”运动，和青年学生、广大群众、市民、工商人士以及各阶层人员参与，通过示威游行、请愿、罢工，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。后进北京大学附设的“留法勤工俭学会”，半工半读。1920 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，攻读中文。在北大，他听了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梁启超、罗素等人的演讲，还见到了毛泽东、徐特立等人。1922 年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专学西画。1923 年拜齐白石为师。1930 年，李苦禅受聘到杭州艺专担任教授。

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，中国美术运动的中心地区是在上海、北京、杭州。李苦禅在这三个地区的美术院校（也是美术活跃的地方）都担任过教师。李苦禅在杭州艺专任教期间，同时应邀出任上海美专兼职教授，并曾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。在沪举办“赵叔孺同门金石书画展”时与上海左联同仁有过接触、交流。潘汉年、夏衍等左联领导也曾到过他的画室交谈。

李苦禅在杭州艺专任教期间，当时杭州艺专是国民党 CC 派的势力范围，但中共创办的左联和一些左派文艺机构影响更大。在教员和学生中各种派别都有，李苦禅支持左派力量，他常用自己不多的薪水资助进步和有困难的学生到延安去。1934 年，李苦禅终因以教授身份屡次支持、掩护爱国学生的革命行动，被校方停聘。他愤然离开杭州，辗转于南京等地，最后又回到北平。回到北平后，李苦禅开始在北平北华美专任教。黄奇南、张启仁（两人为中共秘密地下党员）当时都在北大学习。期间，李苦禅与张、黄二人都建立了不一般友谊。

1935 年，日寇调集大批军队入关，威胁北平、天津。汉奸王揖唐更是上串下跳，成立所谓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标为“自治”实为日本鬼子服务。同年 12 月 8 日，张启仁找到李苦禅、王森然等老师，告诉他们，由燕京大学召集的各校代表会决定，到长安街的外交大楼即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预定成立地点示威游行。李苦禅热情激奋，坚

决支持学生爱国活动，并希望组织进一步号召更多的各界人士参加。

1935 年 12 月 9 日清晨，迎着北平刺骨的寒风，李苦禅和北平的学生们肩并肩、手拉手走上街头，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军国主义！”“反对华北自治！”“收复东北失地！”“反对内战，一致抗日！”“打倒帝国主义走狗！”声震天地。队伍不断扩大。队伍行进在东长安街时，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游行队伍，这就更加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对抗，游行的队伍人员越来越多，人们对着敌特冰冷的水柱和乱舞的警棍，声势不断扩大，激起了全国人民支持，这就形成了震惊中外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。

把画室变成“密点”

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，北平沦陷，汉奸组织“新民会”想拉李苦禅为他们支撑门面，被李苦禅严词拒绝。第二天，李苦禅辞去北华美专、北平美术学院的教学职务，绝不能为日本人控制的学校做事情。

北平教堂的长老黄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“平津特派人员主任”，李苦禅的学生黄奇南与黄浩同乡同宗，并有亲戚关系。李苦禅想和八路军接上关系，经黄奇南介绍，李苦禅和黄浩相识，通过黄浩的请示、介绍，李苦禅成了“黄浩情报小组”秘密情报人员。

随后，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 2 号就成了情报小组成员联络的“密点”。柳树井 2 号是李苦禅的画室，院子很小，小院门朝南开，有三间不大的南屋，很简陋。李苦禅将其中一间用作画室、休息和接地下工作者的地方。交通员、爱国学生、外国友人常在李苦禅家中藏身、中转，然后奔赴抗日战争前线。这些人的姓名、走向，李苦禅从不打听，他明白这一切都是地下工作者的秘密和纪律。

那时，在李苦禅的画室还隐藏着一位特殊人物，他就是国民党第 29 军军官袁祥峰，北平沦陷后，袁祥峰没有能够及时跟随部队南下，辗转躲藏到了李苦禅家中。当时他和李苦禅约定的暗号是：如关着画室门，代表“家中无人，不必叩门”；如果说门开着，没有扫帚，代表“没事，可以进来。”这时，日本鬼子贴着布告：窝藏旧军人者同罪。风声不断，袁祥峰认为不能连累李苦禅，几次提出要上前线去。经和黄浩、黄奇南协商，又经袁祥峰和上级组织同意，在黄浩的

安排下，袁祥峰经秘密交通员护送，到了冀北抗日根据地。

作为特殊的情报人员，李苦禅搜集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街头和外出去画速写，他觉得哪里有可疑的信息，如日本人常出没的汽车，他就到哪里活动，记下车辆的集密度，车牌号码等，期间，已经成为八路军军官的袁祥峰，曾带着秘密任务潜回北平，经李苦禅密函介绍，潜伏到徐州伪伪军军官中，为中共搜集情报。

黄浩在北平还开了一个小诊所，主要是为前线将士秘密收集要用的药品。一次，他接到上级指示，要为前线提供急救西药，尤其是战伤药，愈快愈好。黄浩通知北平 10 多个“密点”，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尽快解决，而且该药单是白求恩在野战医院开的。

当时，在北平买药是很难的，特别是西药就更加困难了。因为大多数药房都被日伪控制了，尤其是战伤用药，他们更是严加把守、监控。李苦禅这时正在生病，他住在老朋友罗耀西开的医院，这里的药是德国拜耳厂出的。李苦禅借这个机会开出不少好药，秘密送给抗日前线的将士。

李苦禅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。1939 年 5 月 14 日，李苦禅以“勾结八路军”的罪名，与学生魏隐儒同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，遭刑讯 28 天，受尽酷牢之灾。敌特对他严刑拷打，但李苦禅坚贞不屈，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。出狱后拒绝伪职，并继续参加爱国活动。

卖画挣钱筹经费

日本人虽然放出了李苦禅，但仍不时派人监视其行踪，企图“放长线钓大鱼”。李苦禅晚年回忆当时的艰苦说道：“共产党是最穷的党，什么工作经费也没有啊！全靠靠自己想办法去筹集呀！我没别的本事弄钱，只有靠卖画挣钱筹集呀！”

1939 年隆冬，天寒地冻。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，携子李杭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，举办“李苦禅画展”。一时间，永安饭店门庭若市，还没正式开展，展出的 60% 画作就都有了主。按当时的规矩，凡是展出有主的书画，一律要挂上红布条，写上收藏人的姓名。迟到的巨贾富商，面对贴着红布条的佳作，只有望画叹息的份了。7 天的画展结束后，李苦禅立即让“黄浩情报小组”成员把钱取走，给地下党组织作经费。为了御

寒，父子俩只是头上一顶旧帽子、一条围脖子，两手空空返回北平家中，但心里很高兴。

转眼到了初夏，李苦禅又携长子李杭到天津“三不管儿”租房作画卖画。“三不管儿”一带百姓很喜欢这位爽快正直又健谈、技艺超群、学识过人的山东大汉，前来看作画的人不少，听聊天讲故事的人更多，富商、洋行、阔老又闻讯而来，10 天内所有画作抢购一空。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，分文未动，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“黄浩情报小组”成员。数次来天津献艺卖画，使李苦禅名冠津城，但无人知晓卖画者的巨款真正走向。

还有一次，这是发生在北平老房子的故事。年关将近，一位大胖子富商来到柳树井 2 号，说道：“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，想请您给鄙行画几个扇面，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。您放心，价格好商量，不会亏待您的。”李苦禅说：“您过奖。画扇面可以，不知贵行需要几个？”结果胖经理讲要 100 个。李苦禅一口答应下来。胖经理付了一小袋银元做定金，约定腊月二十八来取扇面。李苦禅一算，离腊月二十八也没几天了，如按常规一个画，肯定交不了活，怎么办？于是李苦禅父子打破常规，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，流水作业。这笔画山石就一口气画 100 个扇面的山石；这笔画鸟，就一口气画 100 个扇面的鸟……

李苦禅父子没日没夜地工作，不断作画，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 100 个扇面。胖经理如约付了 2000 块大洋，取走了扇面。

这 2000 块大洋解了地下党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，但李苦禅后来再没画过扇面，因为这一次把他画“伤”了。要不是给地下党组织筹经费，他是不会接受这种有违绘画艺术的活儿。李苦禅说：“那年月，不能讲为艺术而艺术了，爱国第一。”

整个抗日战争期间，还有不少像李苦禅这样的无名英雄。在北平海淀区北安河村，有一座古罗马城堡式的花园，这就是贝家花园，园主是李苦禅画家的好朋友、法国人贝熙业。贝熙业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，抗战期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好事，他擅长普通医学及普通外科。曾多次为中国抗日前线运送药品，掩护爱国青年学生，共产党干部、国际友人奔赴革命根据地，为抗战勇士和平民百姓分文不取的医治伤病。1943 年 8 月 7 日，黄浩为逃脱日本宪兵追捕，被李苦禅转移到贝家花园，在贝熙业的帮助下奔赴到抗日根据地。



李苦禅先生国画



李苦禅先生（中）在画室